

# 美國越干預香港 亂港分子下場越悲慘

銳評

方靖之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專題研討會上，正告歐美一些國家和政客：「你們粗暴地踐踏國際法、干涉我國的內政，對我們做的毫無意義的所謂制裁，只能更加激起我們的憤怒和對你們的蔑視，只能不斷敲響你們在香港的代理人——反中亂港分子的末日喪鐘，只能是掀起石頭重重地砸在你們自己的腳上。歷史的長河已經無數次證明，勝利一定屬於不屈不撓的中國人民！」

## 「廢紙制裁」成世人笑柄

夏主任的講話充分反映了中央對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強意志，有底氣有能力應對外國干預。美國的所謂「制裁」或商業警告，動搖不了中央和特區政府捍衛國安的決心，也不會損害香港的營商環境和國際競爭力。说到底，企業選擇投資地不會聽

從政府的指揮，主要看是否有投資價值，美國的橫蠻干預打擊不了香港，只會令其在港的代理人陷入萬劫不復境地。就如過去幾年一些大力呼籲外國「制裁」的攪炒派政黨政客，有再出來「歡迎」美國的「制裁」或警告嗎？有再出來配合美國的政治恐嚇嗎？沒有了。在國安法之下攪炒派終於知道什麼是國安底線，什麼是政治禁區，他們就算有「賣國」之心，也再沒有「賣國」之膽，這就是國安法的威力，這也是歐美對國安法攻擊不遺餘力的原因。

美國財政部日前稱向七名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實施所謂「制裁」，華府並向香港發出商業警告，提醒美國企業警惕香港實施國安法後，在港營商及活動的風險云云。中聯辦隨即發表聲明譴責，直指美國的制裁「除了更加激起我們對美國政客的蔑視、更加激發我們為國家利益而戰的堅強意志外，毫無其他意義。」美國作為世界大國，現在卻變成「世界聲明大國」，沒有停過的發聲明干預、介入香港事務，但這樣的「制裁」究竟還有多少作用？

美國的「長臂管轄」在香港並不適用，「金融制裁」中央官員根本就是一個假議題。中國銀監會發言人已多次表明，香港的經濟、金融活動由特區政府管轄，任何外國政府無權插手。當中說的是所有在香港經營的銀行都不能執行美國所謂「制裁」。這樣的「制裁」對香港而言，確實是一張廢紙、一句廢話、一場鬧劇。

至於向在港經營的美企和個人發出所謂「商業警告」，更是雙重標準，如果因為香港實施國安法而要發出「商業警告」，這樣美國恐怕要對全球大多數國家都發出「商業警告」，原因是維護國家安全從來都是真正的普世價值。況且，美國政府有什麼資格對企業下指導棋？因為政治原因要求企業撤資本身已經違背美國所謂自由經濟。日前，美國商會更對此作出回應，指美企業認為香港仍是一個很好的立足之地，其他多個商會組織和金融機構均發聲反駁了美當局不符事實的所謂警告。

美國無理抹黑香港國安法，但事實是該法實施一年來，港股新股集資額超過5170

億港元，按年增長54%；銀行體系總存款額較國安法實施前增加5.6%，外匯儲備超過3.8萬億港元；全球排名首100間銀行中，78間都在港運營業務，充分顯示出國際商界和廣大投資者對香港市場的信心。美國以為單靠一個聲明，就可以令到大批企業放棄中國市場，放棄最有潛力的粵港澳大灣區市場，這完全是他們的一廂情願。

## 在港代理人被問罪必成棄卒

美國的無理、無用、無聊聲明，以及其肆無忌憚的插手香港事務，不但動搖不了中央、特區政府執行國安法的意志，反而將其香港的代理人置於更悲慘的境地。西方勢力在「黑暴」爆發前後，為代理人提供支持，令他們在香港肆無忌憚的「煽暴煽爛」，肆無忌憚的呼籲外國「制裁」國家和香港。

但國安法出台後，執法部門重槌出擊，將攪炒派打得七零八落，西方勢力除了口頭聲明外，有提出任何支援嗎？沒有。他

們不但沒有任何援助，更罔顧其代理人死活，繼續擺出一副明火執仗干預香港的姿態，這不是正說明中央重槌出擊是正確，也說明國安法出台、新選舉制度的確立，以及連串撥亂反正，追剿外國勢力在港代理人的措施，是必要的嗎？華府愈多「制裁」，愈坐實這些代理人的罪狀，更要求執法部門將外國勢力在港煽風點火的代理人以及NGO、衛星組織一併處理，美國的所為等如將自己的代理人推向火坑、成為箭靶。

這就說明了為何美國近期的所謂「制裁」，不要說在香港社會關注極為有限，連攪炒派也不敢出來表示「歡迎」，當作沒有事發生過一樣，原因不但在於國安法的震懾，更在於他們知道，外國愈「制裁」，中央及特區政府的打擊力度就會愈大，他們的處境也將愈悲慘。「為外國而戰」的黎智英、被華府視作上賓的黃之鋒，現在怎麼樣？誰想步他們的後塵，成為西方勢力的「棄子」？

資深評論員

## 「政務職系」須堅定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

議事論事

童生

作為直轄於中央政府的一個特區，香港享有「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殊政策。政務職系在此政策安排下，擔當着特區政府制訂、落實和推動政策的重要角色。現任大部分高層首長級公務員（常任秘書長、署長等）都來自政務職系。他們會定期被派往各決策局和部門擔任不同職務，掌握了大量管治香港的關鍵崗位和豐富資源，並且享有公務員群體中最高起薪點的薪酬，外界一度稱其為「天之驕子」。

作為具體管治香港的重要參與者，「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紅利的充分享有者，無論是從政治倫理來講，抑或是從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來講，還是從個人利益角度來講，政務職系理應是捍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國兩制」最為堅定的力量之一，理應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最為堅定的力量之一，理應是支持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最為堅定的力量之一，理應是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最為堅定的力量之一。然而，從回歸以來的表現看，一些人與其他公務員、普通市民並無二樣，個別甚至利用自身特有的資源和權力，或明或暗的「食碗面反碗底」。

## 中共賦予施展才華機會空間

為什麼會出現此番狀況？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源於政務職系這支隊伍對香港享有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怎麼來的沒有深刻認識，對自己職位權力怎麼來的沒有深刻認識，對是誰在捍衛香港的政權安全、制度安全和繁榮穩定沒有深刻認識。從根子上來講，就是對領導「一國兩制」偉大實踐的中國共產黨沒有客觀認識。對於政務職系，有三個問題必須搞清楚。

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日益強大，讓英方不得不退還香港，讓港人逐步進入政務職系並逐步走上港英政府高位。早在1947年，港英政府就開始實施公務員本地化政策，但直到1980年，英國一直堅持英國人出任高級政務主任和紀律部隊管理層等關鍵崗位。直白地說，就是英國人牢牢佔據掌控着從高級政務主任到局長、司長、警務處長等所

有重要崗位。直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鄧小平在中英兩國對話和談判中強硬態必須收回香港，英國人不得不退還香港，英國在港公務員不得不撤離香港，才逐步放開政務職系等關鍵崗位，到1983年降到55%左右。

特別是在政治權利方面，英國人是不允許港人公務員參與政治的，直到1990年，才允許在某些規定之下參與政治。臨近香港回歸，不少英國在港高級公務員離任回國，騰出大批高級政務主任、首長級職位給港人公務員。回歸後，在實行政治委任官員制度之前的司長、局長，到實施政治委任官員之後的常任秘書長，政務職系的「金字塔尖」重要崗位基本全部由港人擔任，政務主任職系中港人佔比越來越大。

事實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收回香港，香港人就不可能成為政務職系的絕對主力。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給香港特區高度自治，使港人政務職系得以充分施展才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在基本法設計的行政主導體系下，政務職系各個決策局和各個部門發揮着重要作用。在決策局，政務職系參與制定與社會息息相關的政府政策，管理監察公共資源的運用和重大政府計劃的施行；在民政事務處，政務職系作為政府的前線代表，負責督導和協調有關部門在區內提供政府服務和設施，並監察社區建設計劃；在政府部門，政務職系負責提供管理和督導有關部門向市民提供服務。他們既實質性掌握了大量的政府資源，又佔據了大量的關鍵崗位，既有幹事創業的舞台空間，又有豐富足夠的財力物力人力支撐。

可以說，在特區政府，沒有哪個職系能比政務職系更有才華施展空間，沒有哪個職系能比政務職系更有機會出彩。回歸之前，資深政務官主要由英國人擔任，他們只會教港人政務官辦事情，不會給機會讓港人政務官就複雜、具爭議的議題作出決策。正如葉劉淑儀所講「英國人將我們（中國籍AO）訓練成執行者而非領導者」。

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僅全面打開了港人進入政務職系的通道，更是給了港人政務職系在具體治理香港的足夠信任和必要條件。

是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特區國家安全和繁榮穩定的強力捍衛，讓港人政務職系得以穩妥渡過「港版顏色革命」等重大危機。除了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常任秘書長是政務職系的最高職位，也是公務員體系中最高級別的職級，主要負責協助問責局長制訂政策並帶領屬下公務員執行，須就轄下決策局的運作及其職能所涉及的各個政策範疇的事務向其局長負責。

出任部門或辦事處首長的公務員（多數為政務職系），須就其管轄的部門或辦事處的運作，通過相關常任秘書長向主要官員負責；其他政務主任逐級向部門或辦事處首長負責。由此可見，在具體管治香港實踐中，政務職系從常任秘書長到副秘書長，再到各級政務主任，政務職系成為決策局或部門發揮職能的樞紐幹道，扮演着輔助特區政府應對各種重大風險和協助政治委任官員應對各種管治危機的具體操盤手和參謀團。政府化解各類危機挑戰的對策舉措質量如何，很大程度取決於政務職系的能力和責任擔當。

## 率先示範尊重擁護黨的領導

過去的「黑暴」、「攪炒」等證明，整個政務職系在應對政權危機、制度危機等管治危機上的敏感性、應對能力上全方位不足，無法協助政府管治班子有效應對反中亂港分子的衝擊，無法協助特區政府扭轉回歸以來最為嚴峻的被動局面。幸虧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香港國安法，以及中央政府出台的系列重大決策，香港得以由亂及治，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政權安全、制度安全的法律和執行機制得以加固。事實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政務職系在管治危機中難以為繼。

當前，「愛國者治港」已成為社會共識。作為具體治理香港的核心骨幹，政務職系必須更加深刻理解到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業的領導核心，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領導核心，不僅要積極主動了解認識，還要率先示範尊重擁護。

## 國安家和萬事俱興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有話要說



「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專題研討會日前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會上發表講話。

筆者十分認同夏主任在講話中指出，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以來，一舉扭轉香港亂局，實現了重大轉折。的確，過去一年來，特區政府對各種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從以往「無例可循」變成「有法可依」，強而有力地打擊和懲治相關個人及組織，配合完善選舉制度的法例，扭轉了香港社會許多積非成是的亂象，發揮激濁揚清的作用。

## 危害國安風險仍然存在

然而，從最近香港社會發生多宗威脅國家安全的事件，如「七一」刺警案、拘捕十四名涉及「光城者」案的疑犯，以及港大學生會評議會美化刺警案兇徒的錯誤言論，均顯示本土恐怖主義、外部勢力利用間接手段進行破壞，以及對內軟性宣傳對抗的三大風險依然存在，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仍需高度警惕，除加強執法行動外，更應進一步完善本地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機制，防止這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死灰復燃。

此外，作為香港科創行業的持份者，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基礎上，須採取更多舉措，以令愛國者治港的精神得到全面落實，確保在未來三場對香港發展至關重要的選舉中，選出管治能力強的堅定愛國者，真正為香港成為國際科創中心，以及香港科創業界的長遠發展作出貢獻。

最後，筆者認為「愛國者治港」得到長遠落實，國家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加強香港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增強香港青少年對國家民族的認同等工作必不可少。理直氣壯推動愛國教育，培養「一國兩制」接班人的工作，更需要持之以恆地進行，配合特區政府各種科創人才培育的政策，為香港社會培養一班既有愛國情操，兼備科創思維的青年新一代。筆者深信，隨著各種撥亂反正的舉措相繼落實，國安家和萬事俱興，「一國兩制」必定能行穩致遠。

天津市港區政協委員

## 香港政治撥亂反正依然「任重」

知微篇



周八駿

7月1日銅鑼灣發生「孤狼式」本土恐襲事件後，香港社會若干人士提出一個觀點——香港必須政治和解，特區政府必須採取切實措施。這一觀點的理由是，香港國安法可以止暴卻止不了人們心中的仇恨，消除仇恨要靠去消除產生仇恨的根源。仇恨不易消除，但必須盡快消除，否則，將代代相傳而致香港社會長期分裂。這一觀點看似自治，其實，只是符合形式邏輯，只是從單一角度看問題，經不起推敲。

## 「政治和解論」悖離原則

「拒中抗共」政治勢力與愛國愛港陣營展開20多年你死我活的鬥爭，尤其，經歷2019年6月上旬至2020年6月底逾一年的殊死較量，的確形成香港社會政治分裂和

對峙。不同政治陣營的支持者相互產生仇恨，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必須指出的是，愛國愛港陣營的支持者是以克制來對待「拒中抗共」政治勢力炮製「黑色暴亂」；相反，「拒中抗共」政治陣營的支持者，有些人參與暴亂，有的甚至實施本土恐怖主義，包括「孤狼式」恐襲。所以，所謂「政治和解論」，是指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陣營應當主動爭取「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和解。這樣的政治立場或傾向，悖離「一國兩制」原則。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陣營不應該也不會採納。

「拒中抗共」政治勢力不可能改變政治立場。眼下，他們作鳥獸散，包括團體紛紛解散、二百多名區議員主動辭職等等，是政治形勢使然。這些人大部分留在香港，伺機東山再起。因此，特區政府執行香港國安法、落實完善後的選舉制度，務必雷厲風行，決不鬆懈。

與向「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傾斜的「政

治和解論」相一致，香港社會若干人士還主張，中央和特區政府主動邀請「泛民主派」中一些被稱為「溫和」的人士參加第七屆立法會選舉，並且，確保其中有人當選。這種觀點的理由是，有利於爭取「拒中抗共」政治勢力中產生「忠誠反對派」，有利於香港社會政治和解。

這樣的觀點看似也自治，其實也只是符合形式邏輯，也只是從單一角度看問題，同樣經不起推敲。任何人只要是「拒中抗共」政治勢力的成員，便是認同其政治立場。所謂「溫和」人士，只是在兩大政治陣營對壘中沒有衝在前線。之所以那樣，有些是資歷淺輪不上打頭陣，有些是性格使然願意做「默默無聞」的工作。一個政治陣營或一個具一定規模的政治團體，總會有那樣的分類和分工，但沒有人會據此視同一陣營或同一團體的成員在政治立場上有區別。即使有人據此企圖替某人或某些人開脫，但是，不可能成立。

我反覆闡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可能推行西方多黨制，不可能形成在野黨與執政黨，從而，不可能出現「忠誠反對派」。所謂「忠誠反對派」，是一些人基於對西方政治模式的崇拜而臆想。事實是，沒有一個「拒中抗共」政治團體接受「忠誠反對派」的設計，即使已退出民主黨而另立追求政治中間道路政治團體的人，也已斷然拒絕充當所謂「忠誠反對派」。

## 加快推展愛國主義教育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快演變，香港政治轉變的節奏必定也加快。今明兩年，香港仍須加大政治上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力度。未來五至十年，政治上撥亂反正、正本清源與經濟轉型和民生改善必須齊頭並進，相輔相成。

有人會詰問：不主動爭取政治和解卻繼續加大加快政治撥亂反正將使政治仇恨

代際傳承，豈非香港之福？

的確，政治仇恨可能代際傳承。例如，新中國成立前後一些從內地移居香港的人的後代，至今仍繼承父輩對中國共產黨的仇恨。問題是，如此傳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港英政府鼓勵。

最近，行政長官在「愛國主義教育高峰論壇」上批評，回歸以來香港缺乏系統的愛國主義教育，別有用心者和傳媒把國民教育污名化。

的確，現屆政府必須認真總結上屆政府在推行國民教育上「剝削」的教訓，加快落實通識科改革方案，並且，以宣傳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為重點，與時俱進地向香港全體居民宣傳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形成全社會壓制「拒中抗共」政治勢力的態勢，促使一部分香港居民展開思想鬥爭，放棄支持或同情「拒中抗共」政治勢力的心態。

資深評論員、博士